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一个色彩纷呈的翻译世界

——王宏印先生的译学贡献

津沽学人

张智中





王宏印先生的代表作

王宏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外文化典籍翻译专家、翻译理论家、学者、诗人。作为一名著作等身的学者、甘为人梯的良师,他把做学问视为人生最大的追求,学术涉猎广泛,在翻译理论建构、典籍翻译实践、民族典籍译介和翻译教学等领域均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学术耕耘让读者欣赏到一个色彩纷呈的翻译世界——有对翻译史的追溯,有对译作的剖析,更有对翻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

由博返约的学术历程

1953年2月23日,王宏印生于陕西华阴,1976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今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后有五年时间在西北电管局中心实验研究所负责科技笔译,兼从事导游与学术口译,这段经历为他日后专注于文学翻译和文化典籍翻译奠定了扎实的语言功底。1983年至1984年到上海交通大学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举办的高校英语教师研讨班,学习应用语言学。1988年至1990年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深造,获文学硕士学位,这段留学经历不仅拓展了他的学术视野,也让他对中西文化差异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识。此后,他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底调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直至2019年去世。

王宏印的学术兴趣极为广泛。在治学方法上,他以跨文化研究(心理学、传播学)与比较研究(哲学、语言学、文学)为基础,主要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中西文化典籍翻译与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兼及人文社科类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及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的中外作品包括《公孙龙子》《二十四诗品》《红楼梦》《石涛画语录》《哈姆雷特》以及吴宓、穆旦研究之作等。同时,他在文学、语言学、中西哲学、美学、心理学等领域造诣颇深,多有著述;日常生活中他爱好绘画、书法、音乐,仅乐器就会吉他、笛子、二胡、箫、埙等。这种广博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使他的翻译研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铺开,而是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从科技翻译到文学翻译,从翻译技法到翻译理论,从汉语典籍英译到民族典籍翻译,王宏印的学术历程呈现出一条由博返约、由技入道的清晰脉络。

翻译理论上的开创性探索

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国翻译学建设的基石,当认真总结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是他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书中,他将中国译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肇始阶段、古典阶段、玄思阶段和直觉阶段。这一分期法,跳出了简单地以朝代或年代划分的窠臼,以译论自身的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为划分依据,为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新颖而有解释力的框架。此外,他还在“无本回译”理论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框架。所谓“无本回译”,是指将用异语如英语写作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作品,再翻译回汉语的过程。王宏印以《京华烟云》《大唐狄公案》等文本为例,系统阐述了“异语写作”和“无本回译”的理论概念。这一理论的提出,回应了一个长期被翻译研究界所忽视的现象: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最初并非用中文写成,而是由外国作者用英文或其他语言创作。

如果说上述著作是对前人译论的梳理与总结,那么“翻译境界论”则是王宏印自身翻译诗学的创造性建构。“翻译境界论”的核心要义,在于将翻译从单纯的语言转换提升到审美创造的层面。王宏印认为,理想的翻译不应止于“达意”,而应追求“传神”;不应满足于“信达雅”的技术标准,而应追求译作作为独立艺术品的审美境界。这一观点体现在他的翻译实践中——无论是《哈姆雷特》的重译,还是陕北民歌的英译,他都力图在忠实于原作精神的前提下,创造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译文。“翻译境界论”的提出,标志着王宏印的翻译思想从“怎么译”的技术层面,跃升到“译到什么程度才算好”的价值层面。它不仅是对传统译论“信达雅”标准的深化,更是对翻译本质的一种哲学思考——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对话、审美的再创造。

在民族典籍翻译领域,王宏印最具开创性的贡献,是构建了“人类学诗学”翻译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深度融合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与“深描”方法,以及诗学理论的审美阐释与形式关切。“人类学诗学”翻译理论以“文化翻译”为基石,其核心在于将民族典籍的翻译置于更广阔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之中。它不再将翻译仅仅视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视其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诠释。在这种视角下,民族典籍的翻译不仅要传达文本的字面意义,更要传达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生活方式和审美体验。王宏印将西方人类学诗学理论与中国民族诗学翻译研究相结合,为中国式人类学诗学的构建作出重要贡献,他也因此被学界公认为典籍翻译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更是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拓荒者和领路人。

多文体有独创的翻译实践

莎士比亚戏剧的汉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篇章。从朱生豪到梁实秋,从卞之琳到方平,几代译者为莎剧的汉译付出了巨大心血。王宏印的《哈姆雷特》新译本,体现了译者的独创性。首先,在译本体例和翻译方法上,他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打破了此前莎剧汉译中较为固定的翻译模式,在保持原作戏剧张力的同时,注重译文作为独立文学文本的可读性。其次,在语言运用上,注重自然语言的融合,避免使用过于欧化的句式,也不刻意追求文言化的表达,而是在现代汉语的自然节奏中寻找与莎剧语言风格的对应。这种语言策略,使他的译本既不同于朱生豪典雅流畅的散文体,也不同于卞之琳试图以汉语格律对应莎剧无韵诗的尝试,而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莎剧汉译之路。更重要的是,王宏印的译本兼顾了可读性与舞台表演效果。在哲学层面,他对《哈姆雷特》的深层理解与表达也颇具特色——不仅仅是在翻译一部戏剧,更是与莎翁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哲学对话。这种深层次的理解和表达,使他的译本在思想深度上达到了新高度。

如果说《哈姆雷特》的翻译体现了王宏印“引进来”的功夫,那么《西北回响——陕北民歌英译》的出版则体现了他“走出去”的自觉,这部译作也是其在民歌翻译领域的代表作。他从思乡情结出发、以音乐节奏感为引导,使《西北回响》的翻译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品质。在翻译策略上,王宏印通过仿造翻译、增译和省译等方法,既“求真”于原文和作者,又兼顾“务实”于读者和社会,使译本保留了陕北民歌的语言特色,再现了陕北民歌自然朴实的风格,传递出劳动人民朴素真挚的情感。他的这一部译作,为民歌翻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

王宏印在民族典籍翻译领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理论建构上,更体现在大量的翻译实践和系统性的研究工作中。《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著作系统梳理了中国各民族典籍翻译的历史、现状和问题,提出民族典籍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这一新兴的翻译研究领域奠定了学科基础。在实践层面,王宏印的翻译触角延伸到世界多个民族的文化典籍中——对北美印第安诗歌的汉译,是在西方人类学诗学理论观照下的翻译实践;将原始印第安诗歌译入汉语的过程,既是对异域民族文化的一次译介,也是对人类学诗学翻译理论的一次实践检验。这种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的良性循环,贯穿了王宏印的整个学术生涯。此外,他还翻译了诗歌评论、画论、书法论、秦腔剧本等多种体裁的文本。这种跨越诗歌、散文、戏剧、艺术理论等多种文体的翻译实践,使他的翻译经验异常丰富,也为他的翻译理论提供了多元的实践支撑,二者互为滋养,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套具有个人特色的翻译思想体系和治学方法,为中国当代译学的发展留下丰厚遗产。

学科建设的奠基之功

在具体的翻译作品之外,王宏印在翻译教材编写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是国内首部面向翻译硕士、系统训练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教材,全书共二十四讲,按历史顺序安排选材,内容涵盖中国文化史中的上古神话、先秦诸子学说、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剧散曲、明清小说、文人书信等各个方面,规模宏大,体系完整。这部教材的编写,体现了王宏印对典籍翻译学科建设的深远思考,他提出典籍翻译应建立原文、注释、今译和英译的完整体系。这一主张将典籍翻译从单纯的“从古汉语到外语”的语言转换,扩展为包括原文整理、注释阐释、现代汉语转换和外语翻译在内的系统工程,大大提升了典籍翻译的学术含量和教学可操作性。同时,王宏印还编著有《世界文化典籍汉译》《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等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版,为中国翻译专业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王宏印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翻译研究者和实践者,也是一位卓越的翻译教育者,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作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培养了大批翻译专业人才;围绕翻译能力培养和翻译笔法形成而展开的翻译教学思想,对推动翻译教学话语研究和相关讨论具有重要意义;他将学术研究融入生命体验的治学态度,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王宏印在学术组织方面也作出重要贡献,他曾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等职,这些学术职务使他能在更大的平台上推动典籍翻译研究和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发展。他倡导并推动全国典籍翻译研究会的学术活动,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会议和研讨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典籍翻译研究从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研究方向。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更是从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领域,发展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方向。他在翻译理论、典籍翻译、民族典籍翻译等领域的著述,均具有较高的被引频次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可以说,王宏印的学术影响已经超越了翻译研究本身,辐射到了文化研究、民族研究、跨文化交际等多个学术领域。

2019年12月17日,王宏印先生因病在天津去世,享年66岁。此前不久,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然而他未能亲眼见到获奖证书。在病榻上,他曾写下一首小诗与后学共勉:

翻译未必要资深,自古青年出才俊。译坛代有名译出,融通中西师严林!

这短短四句诗,既是一位毕生从事翻译事业的学者对后辈的殷切期许,也折射出他一生追求的精神境界——融通中西,以翻译为桥梁,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系主任、中华诗词外译中心主任)

学人小传

王宏印(1953—2019),陕西华阴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英语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政府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出版各类著作七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著述总字数约两千万字。代表性著(译)作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诗品〉注译与司空图诗学研究》《穆旦诗英译与解析》《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世界文化典籍汉译》《哈姆雷特》《西北回响——陕北民歌英译》《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朱墨诗集》等。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何以副刊

其气芬芳 其象旷远

——父亲周汝昌和《天津日报》副刊

周伦玲



报纸有大小之分,有薄厚之别,其版面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父亲常常是打开报纸,先翻看副刊,关注副刊,看看刊登了哪些人的文章,有哪些有意义的作品。他会把自己关注、喜欢的文章用红笔圈起来,旁边写上“保存”二字。

《天津日报》副刊有两大版块,一是“文艺周刊”,一是“满庭芳”,都是父亲喜欢看的,刊发的诗歌以及“沽上丛话”等栏目他每期必看。父亲曾撰写过《故乡津市名胜新咏》,在“宫南别苑”小记中提到天后宫,“吾乡之天后,即台湾之妈祖,其香火崇祀之盛,甲于环宇,遐迩艳称。是以我敢断言:后于我沽,原为祈福保安之神,而在两岸,则中华一统河山之和平女神也”。那个时候,父亲就借助副刊的影响力,以妈祖文化的书写联结两岸的文化情感。

上世纪80年代初,“满庭芳”版面创刊时,父亲给予了极大支持,对“满庭芳”这个名称也极其欣赏,说“满庭芳”副刊的特性就是一庭茂草,虽非参天大树,但是其气芬芳、其色润绿、其质柔韧、其象旷远、其生不息——“春风吹又生”“径草踏还生”,它既是芳草,不容荆榛混杂、搅扰,也不会变成蓬蒿。

父亲与《天津日报》副刊联络最多的时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记忆中,1983年9月,在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顾问委员会成立不久,他就写了一篇《红楼电视谈》,介绍此剧拍摄的意义和难度;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红楼梦〉剧序》,向读者宣传介绍1987年版《红楼梦》剧本。他还写过回顾童年经历的《少年书剑在津门》,记下自己的一段抗战心路历程。

最让我难忘的,是《天津日报》副刊为父亲特别开辟了一个专栏,叫作“响晴轩砚渍”。“响晴轩”是父亲的一个斋名,“砚渍”就是留下的笔墨痕迹,专栏名字非常贴切。这个专栏始自1987年年底,差不多结束于1997年。父亲结缘我续缘,2014年,我接下“响晴轩续话”专栏,也开始为《天津日报》副刊写稿。

在“响晴轩砚渍”里,父亲写的文章品目繁多,五花八门。他钟情于天津曲艺,介绍过“天津红楼曲艺专场在京献艺”;他喜欢忆旧,写过旧时过年的《渊渊鼓音》《过年须说吉利话》;他酷爱中华文化,写过《中华文化八千年》;他佩服同窗,写过《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父亲曾说过研究书法比红学难,因此写了关于书法的一组文章,如《柔翰与八法》《画的精义——书画之本》等;父亲研究天津的历史,写了《天津祖地——大直沽》《直沽大小自谁分?》;他痴迷天津皇会,写了《海大道·柳劫·皇会》等文章……

1992年11月6日,当“满庭芳”创刊满千期时,父亲撰《巧媳妇赞——庆贺“满庭芳”1000期》一文,赞扬了“满庭芳”的文采风流,脍炙人口,说真正的功臣是本刊拥有的几位“巧媳妇”,指的是版面的几位编辑同仁;2000年3月,值“满庭芳”创刊两千期时,父亲又写下《“满庭芳”两千期贺语》,以示祝贺与赞许。

满庭芳——满院香!父亲与“满庭芳”的缘分越来越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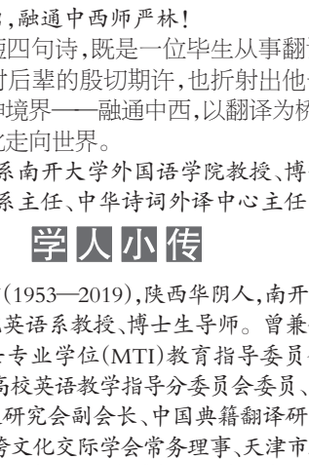
有了“满庭芳”版面的大力支持,父亲精神也为之大振,他连续撰写了一组“域外红情”文章,向读者汇报在美国访学期间参与的有关《红楼梦》的活动;父亲还写了多篇介绍与师友朋俦交往的文章,如《知音多少在津门》《记张君秋》《钱钟书先生》《沈从文先生》等。那是父亲最美好的一段时期。

父亲说,一家好的报纸,要有一个相当的“窗口”,让读者借此“口”之光而得知其地的文化教育、文学创作是怎么样的。报纸副刊好比民族文化的阵地、精神世界的家园、学术传承的渊薮。博览方能充实,充实则绽放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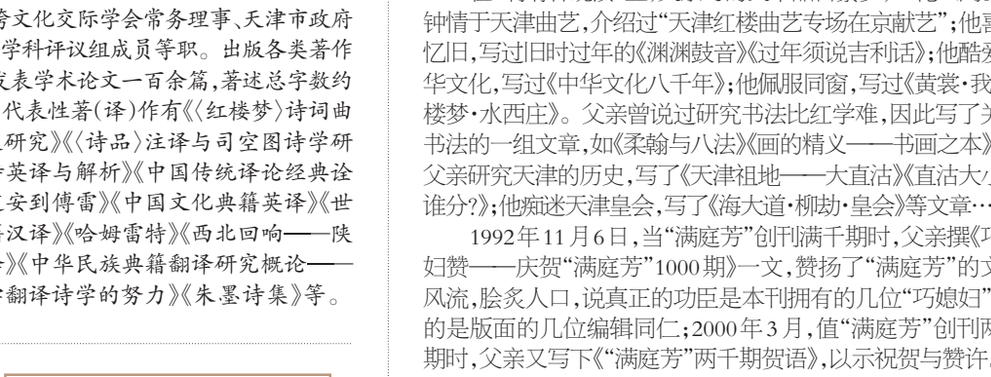
美好的副刊!难忘的副刊!

祝《天津日报》副刊发扬光大办刊传统,越办越好!

(作者系文史研究者,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之女)



满庭芳 第五五〇五期



南美行纪(四)

参观人类学博物馆

薛冰

上午9时,我们一行人乘车去参观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这是拉美地区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学博物馆——从非洲老祖母进入美洲原始人类发展,直到辉煌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展陈内容极为丰富。如果说前一天看到的是玛雅文化的宏观叙事,那么今天看到的则是创造那种宏观叙事的人。

博物馆展示区域分上下两层,一层是十二个考古展厅,二层是民族学展馆。考古展厅以大量珍贵文物为载体,顺次介绍了印第安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美洲印第安文化多元并存,有着复杂的时间与空间关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简单来说,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400年间的奥尔梅克文化兴盛较早,创建了大型纪念碑、巨石头像和金字塔等,其中用整块玄武岩雕刻的巨石头像重达数吨,我们看到的是一尊重达30吨的头像,扁平鼻、厚嘴唇,造型极具冲击力,令人震撼。奥尔梅克文化因其在雕塑、神庙建筑、历法等方面的率先发展,被认为是整个中美洲文化共同的基石,其金字塔、神庙、玉器雕刻、历法、玉米神崇拜等启发、促进了玛雅文化的发展。

研究者一般将玛雅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约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300年的前古典时期、公元300年至900年的古典时期和公元900年至1697年的后古典时期。展览中可以看到前古典时期最早的玛雅人定居村落模型,包括玉米、棉花种植和狩猎活动,历法和文字的发明,早期的宗教艺术品以及特奥蒂瓦坎古城遗址的模型等。古典时期是玛雅文化的全盛期,展厅内展出大量的石碑、石雕、壁画、彩绘陶器以及各种金属制品,如笑面人像、彩绘人像锅、美洲虎瓮、雨神像瓮、玉米神像石斧、人面纹香炉等。展厅中还按实体大小复原了古典晚期的帕兰凯王墓,其中精美的高浮雕墓盖、翡翠面具及豪华饰物令人印象深刻。



玛雅文字也是一种象形文字,已知的表意和表音符号有800多种,词汇量约有3万个,刻在石柱、陶器和玉石等上面。尤其是高大石碑上镌刻的排列整齐的玛雅文字,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甲骨文,同样是用象形文字记录史事,只是选择的载体不同。现存玛雅文抄本只有几部,多分藏在欧洲的图书馆中,至今尚未完全释读。展厅里可以看到西班牙人编制的几种玛雅文识字课本。

阿兹特克人最初生活在墨西哥西部的海岛上,11世纪中叶开始向墨西哥盆地迁移,15世纪强盛扩张为中美洲各部落的盟主,发展成早期奴隶制国家,其文化吸收了玛雅文化的很多元素。直径3.6米、重达24吨的太阳历石是阿兹特克文化的辉煌象征。16世纪阿兹特克城邦被西班牙人征服,而最后一个玛雅城邦于1697年被毁灭。

二层的民族学展馆,展示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用具,以服饰、兵器、宗教用品、乐器等文物反映墨西哥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与一层的历史考古两相映照。

如此丰富的内容,细看至少需要两天。我们的参观时间仅有两个多小时,过于仓促。幸运的是,墨西哥的地陪小朱是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以专业眼光挑选最典型的展品作简明扼要的讲解。正是因为听懂了,更令人生发意犹未尽之感。

在国外旅游,地陪导游非常重要,随团的国内导游实际只是领队,负责日常事务处理,讲解全靠地陪。但是地陪又是当地旅行社派遣的,国内旅行社并不了解,所以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小朱看上去有些拘谨,市区游览时讲得也平常,但在特奥蒂瓦坎古城大家走散时,关键时刻见识了他的真功力。

在墨西哥城里,小朱带领我们参观了三文化广场,此地最初是印第安人的石构祭祀建筑,后来西班牙人在后侧建造天主教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政府又在附近建起了现代高层建筑,此广场遂因三种文化并存而得名。

墨西哥城的现代轴线是改革大道,道路宽阔,两侧多是现代高层建筑,串起一系列城市广场。我们在天使独立广场周边散步,路旁有许多行为艺术家的简易表演棚,少有行人驻足观看,偶有游客围观。为弥补未能参观总统府的遗憾,晚饭后我们游览了宪法广场,广场东侧的总统府和对面的市府大厦晚上都不开放,只能欣赏外观。广场北侧的大主教堂建造时间历时两个半世纪,融合了文艺复兴、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风格,射灯照映下的双钟楼尤其显得壮观。

当晚,我们从墨西哥城飞抵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继续玛雅文化探索之旅。

插图:阿兹特克文化巨石雕像。

沽上丛话